

第四十三辑·

重庆文史资料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文史资料

第四十三辑

纪念抗日战争 50 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9 号

主 编 徐朝鉴

副主编 李宗杰 杨耀健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四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8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621-1341-6/K·72

定价:3.00 元

目 录

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	冯开文(1)
周恩来与重庆“雾季公演”	石 曼(3)
冯玉祥矢志抗倭	杨耀健(14)
冯玉祥在陪都的抗战岁月	蒋寿光(17)
陪都时期的吴国桢	陈兰荪(23)
陪都时期的郭沫若和他的历史研究	况 闻(42)
郭沫若与陈布雷	李莹华(52)
汪精卫出逃	杨耀健(58)
屈武在重庆	梁星亮 张守宪(62)
活跃在陪都涉外新闻界的龚澎	张 颖(66)
黄汲清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地质事业	黄立人(73)
德优怀远 爱国情深 ——记金锡如教授	金 鑫 蒋寿光(88)
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友绿川英子	孙金科(96)
出川抗战亲历记	庞佑珣(107)

勿忘历史

- 漫忆抗日时期的陪都 姚江屏(129)
- 日机轰炸下的市民生活 淦康成(140)
- 在重庆跑警报 陈未云(146)
- 重庆苏联塔斯通讯社杂忆 方土人(149)
- 忆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 何宏钧(162)
-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煤炭基地北碚 张太超(169)
- 国民党军新八师破坏黄河铁桥及
花园口决堤情形记录 熊先煜(175)
- 永远忘不了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 王 伟(186)
- 影人剧团十姐妹 吴 茵(191)
- 我和应云卫的交往 徐世骥(195)
- 余克稷和怒吼剧社 逸 云(200)
- 阎哲吾与实验剧教队 胡绍轩(209)
- 难忘的会见 吕 恩(213)
- 曾家岩 50 号的亲切聚会 刘厚生(216)
- 我去过几次周公馆 石 羽(218)
- 快哉此夜行 柯尧放(222)

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

冯 开 文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著名画家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就是其中之一。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忙于与蒋介石的谈判外，还要会见各阶层人士与老朋友。柳亚子与毛泽东互赠诗词后，柳亚子与画家尹瘦石商量，想乘毛泽东来渝，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的愿望，搞个诗画联展，向民众作一些和平建国的宣传。柳亚子提出在展览中展出一张毛泽东的近期画像，肯定倍受欢迎。尹瘦石表示极力赞同。

尹：“毛先生这么忙，他同意吗？”

柳：“放心，这件事由我来办。”

尹：“那你的意思是叫谁来画？”

柳：“当然非你不可哟！”

尹：“过奖、过奖。我就遵命吧！”

10月2日，尹瘦石去沙坪坝津南村柳亚子的住地，商谈办联展事宜。柳亚子说：“毛润之先生约我今天去谈话，我俩一同去，利用这个机会请求给他画一张像，联展就可以用上了。”在红岩村与毛泽东一见面，柳亚子就提出给他画像的请求，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并请王若飞负责具体安排时间。

三天后，尹瘦石随周恩来的车由桂园来到红岩村。经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安排，在一间房内等候。

大约几分钟后，毛泽东微笑着，健步走进来。“怎样画呀？”毛

泽东有点好奇地问。“请您坐在藤椅上，随便一点。”尹瘦石很有礼貌地说。尹瘦石抓紧时间，聚精会神，挥笔作画。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他眼前展现……

大约 40 分钟过去了，尹瘦石放下画笔说：“已经画好了。”

毛泽东满面笑容走过来，看了看画说：“画得像不像啊？”问站在一旁的钱之光处长。“像、像”，钱之光连连点头。

毛泽东起坐，紧握画家的手，说：“辛苦了！”并兴致勃勃地留他吃饭，尹瘦石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连声道谢，告辞。

展览开幕当天，周恩来、王若飞等亲临参观，盛况空前。《新华日报》10 月 25 日专门开辟了专栏，毛泽东亲笔题写“柳尹诗画联展特刊”同时刊载了郭沫若、茅盾、徐悲鸿等人的观展文章。

画家尹瘦石是中国唯一的一位为毛泽东画过像的人。为此，感到无限的荣幸与自豪。

一代伟人毛泽东已离开了我们，他与人民心连心，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画家尹瘦石 1919 年 1 月出生在江苏宜兴，1933 年入宜兴陶瓷职业学校学习绘画。1938 年考入武昌艺专。1940 年任广西省立艺术馆研究员，这时期的创作主要是反映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表现历史上的先进人物。1942 年、1944 年曾两次举办个人画展，尤以人物画为佳，曾作正气歌十四图，石壕吏八幅，以及大幅之伯夷叔齐、屈原、郑成功等人物。1946 年到张家口，任教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后随文工团深入牧区。这时期创作主要是描绘蒙族人民新的生活。这阶段当过报社编辑，编印过画报、担任过内蒙古美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1957 年调任北京中国画院副秘书长，1979 年任北京画院副院长。历任北京美协主席、北京书协副主席和文联副主席。他还擅长画马，用笔泼辣，水墨交辉。代表作有《万马奔腾》、《伫马太行图》等。

周恩来与重庆“雾季公演”

石 曼

1941年10月11日，重庆“雾季公演”揭开大幕。从这天起到次年5月初，演出了《北京人》、《棠棣之花》、《天国春秋》、《屈原》、《结婚进行曲》等大型话剧29出，另有独幕剧、小歌剧和大歌剧《秋子》共35出。一个城市在7个月时间内，集合自己的力量，公演30多出话剧，这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至今仍是空前的，更何况这时创作首演的名剧迭出。这正如戏剧史家所说，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是40年代的重庆“雾季公演”。

1941年初，寒冷笼罩在中国土地上，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接着在大后方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党将不便在重庆工作的人士分批逐步撤离，为数甚多的戏剧工作者的心绪处于苦闷、愤怒之中。2月5日，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著名戏剧家洪深与夫人常青真，以及他们的患肺结核的女儿，在赖家桥家中服毒自杀。洪深留下遗书谓：“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食衣住种种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我也管不尽许多了。”洪深幸得郭沫若等及时抢救、周恩来之关怀，乃脱离险境。就在这段时间，另有一部分进步文化人想去解放区。周恩来为此答复郭沫若：反共高潮一定会被击退，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国统区需要有人开展工作。在此不久前，青年话剧演员周峰闯到红岩村见到周恩来，要求到延安去。之后，周恩来要南方局文委工作人员告知周峰，重庆有活动条件，有固定职业者，不应该放弃阵地。

阳翰笙在家乡高县住了不及两个月，五月下旬就回到重庆参加首屈诗人节庆祝会。留在重庆的戏剧工作者沈浮、应云卫等向阳翰笙提出：“老在这里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阳翰笙乃向周恩来提出组织民间剧团的想法。周恩来赞同阳翰笙的想法，并在南方局文化组会议上提出：在重庆这个城市中，人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会后经与徐冰、阳翰笙、陈白尘等研究，同意成立中华剧艺社和阳翰笙提出的建团计划：剧团除设有少数基本演职员外，大部分演出人员来自官方的“中万”、“中电”、“中青”等剧团，利用他们业余时间参加这边的工作，这样生活有保障；剧团演出现实主义作品，以借古讽今，旁敲侧击的办法进行战斗；请听党的话，政治色彩不太浓，业务懂行的应云卫担任社长。接着周恩来提出在重庆、延安、成都、桂林、昆明等地庆祝郭沫若 50 寿辰和创作 25 周年纪念，通过祝寿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冲破顽固派在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941 年 10 月 11 日，中华剧艺社的《大地回春》，打响了“雾季公演”第一炮。接着，《棠棣之花》、《天国春秋》，揭开庆祝郭沫若 50 寿辰的帷幕。在中华剧艺社成立和庆祝郭沫若寿辰活动鼓舞下，重庆其它几个话剧团体也好戏纷呈。曹禺的《北京人》，沈浮的《重庆 24 小时》、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都是创作首演。郭沫若的《屈原》，把“雾季公演”推向高潮。

在 7 个月的首届“雾季公演”中，陈白尘有三个新剧本上演；石凌鹤导演了五出戏；陈鲤庭、应云卫、贺孟斧各导演了三个大戏；白杨、舒绣文、魏鹤龄、耿震、江村、陶金、章曼苹都在三、五个戏里担任重要角色。张瑞芳演了六部戏，其中在《北京人》、《棠棣之花》、《大雷雨》、《屈原》中担任的角色都极重要。新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公演了九部话剧。这般业绩，在中国话剧史上至今都是空前的。

1942年春，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文委报告重庆一年来文化运动的工作情况时说：“我们着重抓了当局尚未注意的演剧运动，演了一些优秀剧目。”4月下旬，第一届“雾季公演”接近尾声，周恩来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席间周恩来说，“在连接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重庆在以后几次“雾季公演”中，1942年至1943年演出大型话剧23个；1943年至1944年演出话剧27个（其中4个独幕剧）；1944年至1945年11月演出大型话剧28个。四年间共公演大型话剧103个、独幕剧7个，话剧史家称之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中影响广泛的演出有：中国万岁剧团的《蜕变》、《虎符》；中央青年剧社的《北京人》、《清宫外史》（第一部）、《鸡鸣早看天》；中电剧团的《结婚进行曲》、《金玉满堂》、《万世师表》；留渝剧人的《棠棣之花》、《大雷雨》、《重庆24小时》、怒吼剧社的《安魂曲》、《牛郎织女》；孩子剧团的《猴儿大王》；中国胜利剧社的《重庆屋檐下》；育才学校戏剧组的《哪格办》。

参加“雾季公演”的还有戏剧工作社、中宣部实验剧团、教育部实验剧队、实验剧院、新中国剧社、中央银行业余剧团、邮工剧团、中国业余剧社、中央广播电台、新生剧社、东方剧社、力行剧社、东吴、沪江大学法商学院、朝阳大学剧社等。中华剧艺社，和1942年底成立的中国艺术剧社则是其中的主力军。

中华剧艺社在1941年8月先在重庆南岸苦竹坝集合周峰、张立德、丁然等二三十人为班底，后又有张逸生、金淑之等参加。由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刘郁民、孟尹谋、贺孟斧组成理事会，应云卫为理事长，以夏云瑚为经理的国泰大戏院为演出基地。“中艺”自首演《大地回春》后，两年间公演了《天国春秋》、《屈原》、《钦差大臣》、《忠王李秀成》、《法西斯细菌》、《长夜行》、《风雪夜归人》、《复活》等名剧。许多重要演员如白杨、顾而已、

魏鹤龄、吴茵、施超、舒绣文、路曦、石羽、秦怡、耿震等，都请自“中电”、“中万”、“中青”等官办剧团。由于《天国春秋》、《屈原》等剧的演出，借古喻今，批判了国民党同室操戈，陷害忠良的行径，国民党当局对“中艺”的演出乃百般刁难，1943年6月起国泰大戏院只准放电影，不准演话剧，使“中艺”失去演出场地，于6月8日撤离重庆去成都。

抗战后期重庆剧坛劲旅的中国艺术剧社，1942年12月29日成立，领导成员有于伶、司徒慧敏、章泯、金山、宋之的。设总干事，首任者为金山。剧社初期主要骨干是从香港撤退回来的凤子、沙蒙、舒强、王苹、柏李、蓝马、林朴晔等，以及原在重庆的陈鲤庭、张瑞芳、胡子等。他们把道门口的银社整饰一番作为演出基地。1943年2月4日首演宋之的《祖国在呼唤》与观众见面，以后三年间演出了《北京人》、《家》、《杏花春雨江南》、《戏剧春秋》、《草木皆兵》、《春寒》、《离离草》、《清明前后》、《芳草天涯》、《岁寒图》等15出话剧，共470余场，其中《家》达86场，为重庆抗战剧坛上座率居高者。参加工作的除上面提及者，尚有叶露茜、赵韞如、虞静子、蒋天流、黄宗江、路曦、丁然、顾而已、秦怡、周峰、陶金、孙坚白、吴茵、王为一、王戎、吕恩等演员，洪深、史东山、郑君里、贺孟斧等导演，丁聪、姚宗汉、张尧、李恩杰等舞台美术家。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在艰难困苦中成长壮大，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棠棣之花》是为郭沫若祝寿的第一个剧目，周恩来尤为关心。就剧本创作言，剧中关于春姑摘桃花送行的动作和台词都是在他帮助下最后决定下来的。1941年12月15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对《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函曰：“沫兄：剧本读过，我在字句上的斟酌，另纸书上，请考虑。”这个“字句上的斟酌”，包括了二至五幕，长达二千余字。

《屈原》从写作到演出都是在周恩来关怀下进行的。1942年1

月，剧本写成后周恩来亲自到天官府听郭沫若朗诵，给予极大鼓励和热情肯定，并继续考虑屈原和《屈原》剧本中一些问题。3月7日周恩来致函郭沫若，就郭写《屈原研究》一文谈到屈原说：“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屈原》上演后，轰动山城，尤其是剧中的《雷电颂》广为流传。《中央日报》、《中央周刊》有文章攻击《屈原》，说它“不符合历史真实”。周恩来经过认真研究后说：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他针对《雷电颂》表示特别赞赏，并说：“屈原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他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作为文艺家挚友的周恩来，这一时期，他对郭沫若历史剧的创作给予了极为热情的鼓励与帮助。如发现重要问题，则毫不隐讳及时提出。1942年9月8日，郭沫若写成《孙雀胆》。周恩来看了觉得有不当之处。9月27日，周恩来、邓颖超去赖家桥文工会看郭沫若，对《孔雀胆》提了意见，主要是剧中段功对蒙族统治者梁王过分忠勇，以这种团结来对付农民运动中的明玉珍实为不当。

12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约好晚上看望郭沫若的，因为实在忙，他嘱张颖去天官府郭家传话说：《孔雀胆》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此时上演这个戏，意义上不可能与《屈原》等剧并论。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商量决定。对于这个意见，郭沫若是接受的，但因为演期已近，而未能修改。周恩来对文艺家总是以诚相交，以平等态度相待，自己的意见绝不强加于人。在《孔雀胆》以后演出中，郭沫若作了修改。

1942年10月17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在国泰大戏院公演，这是夏衍到重庆后写的第一个剧本，周恩来至为关心。23日，

周恩来约请了吴在东、丁瓚，奥地利人弗来茨·杨生等五、六位医生看戏，请夏衍作陪，听取意见。周恩来三次看了该戏的演出。

应该提及，在“雾季演出”中，进步戏剧界与国民党当局，不只是一味的斗争，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需让步时也作出让步。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了蒋介石，剧中上清宫的地名也疑为指蒋介石住处上清寺，禁演了该戏。后经阳翰笙、郭沫若与周恩来商量，由剧团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去掉一些露骨的影射蒋介石处，该戏得与观众见面。

周恩来对剧作家阳翰笙、曹禺、陈白尘、于伶、宋之的、吴祖光，以及新近提笔参加到戏剧队伍中来的老舍、茅盾等也无不予以关怀。这一时期曹禺创作出来的《北京人》、《家》，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茅盾的《清明前后》，以及稍前些时期宋之的的《雾重庆》，老舍的《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等，连同上述郭沫若、夏衍的作品，它们不仅当时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历史证明它们都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成为我国现代戏剧文学中的精华，几十年来在我国舞台上常演不衰，有的作品已跻身世界文学之林中放射光彩。

然而也有人对这一时期戏剧创作另有看法，如有署名田进者，在《新华日报》发表《抗战八年戏剧创作》一文（1946年1月8日），他以戏剧创作是否直接反映抗战为标准，统计出1941年后的戏剧创作直接及间接描写抗战者只占8%，由此发出惊呼：“直接描写抗战的作品锐减，描写后方尤其是描写历史和与抗战无关之作骤增！”并谴责说：“我们有若干剧作者在若干作品中，自己先就向现实作了大大的让步。”差不多与此同时，茅盾发表了如下看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始终在苦斗；……出版检查之严密，禁忌之多，使得作家们的写作自由完全被剥夺。……后来成为三种主要倾向。第一种：与其不痛不痒反映小限度

的现实，不如干脆不写，转而写些最有现实意味，足以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第二种：既然对于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现实没有写作的自由，那就写敌我游击区，写沦陷区，乃至‘阴阳界’；……第三种：与第一种用心略同而意义纯为守势的，则为介绍世界古典名著。”（《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1946年1月6日《文联》1卷1期）

“雾季公演”期间，周恩来不仅关心剧本创作，同时也重视戏剧评论工作。他常对在身边工作的张颖、陈舜瑶说：戏剧演出需要通过评论文章才能吸引观众和教育观众，把观众的意见转达给艺术家，使他们得以修改。《棠棣之花》演出，《新华日报》出版了《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周恩来题写刊头，并修改了《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诗，壮丽的图画》两文。《新华日报》尤为重视剧评工作，总编辑章汉夫，每当有新戏演出，听到有些议论，他就要求记者、编辑组织剧评，所以这一时期剧评占了不少篇幅。在此影响下，重庆的《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等报刊也发表了不少剧评，形成了一支颇具影响、推进戏剧运动的戏剧评论队伍，其中刘念渠（笔名颜翰彤）几乎是每戏必评，言多中的。

1941年秋，曹禺《北京人》演出与出版，有的评论认为曹禺在写出《蜕变》以后，又去写抗战前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故事，退到与抗战无关上面去了。周恩来让身边的人进行讨论。1942年《北京人》再演出时，《新华日报》2月6日发表了茜萍（张颖）的《关于〈北京人〉》一文。文章说《北京人》可以“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这就回答了说《北京人》与抗战无关的批评。周恩来于2月初，在阳翰笙陪同下前往抗建堂观看演出，并去后台看望了导演张骏祥，赞扬江村、张瑞芳、沈扬、耿震等人的表演，以示对《北京人》的赞赏与支持。

1943年2月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演出后，也引起一些议论，有的说这出戏完全是旧社会戏子与官家姨太太的恋爱故事，与现实生活一点也联系不上，没有意义。周恩来身边的人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个剧本对封建社会的腐朽作了深刻的揭露，对最遭鄙视的艺人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是对旧社会强烈的控诉。周恩来也参加过讨论，他不仅喜欢这个剧本，并多次观看了演出。根据这些意见，由章罍写成《评〈风雪夜归人〉》一文，发表在3月15日《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日，夏衍新作《芳草天涯》。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演出。这是写知识分子爱情纠葛的戏，剧本细腻地刻划了人物心理，从平淡中发掘戏剧冲突，富艺术魅力。夏衍在剧中借人物之口，提出在恋爱与家庭问题上有了纠葛不妨容忍一些。这出戏上演正值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时期，又是茅盾的《清明前后》上演之后，在《新华日报》为这两出戏举行的座谈会上，有人批评《芳草天涯》是一种“非政治倾向的作品，和《清明前后》恰成对照”。之后，剧中“容忍”一词，也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周恩来看了文章后，曾让人告知夏衍，可以写篇不同意见的文章。夏衍认为，自己人不必在报上打笔战。夏衍的这种态度，受到周恩来的称赞。

戏剧演出单有好的剧本是不够的。“雾季公演”一开始，周恩来就要求《棠棣之花》、《天国春秋》、《屈原》诸剧的演出起到克敌制胜的作用，除了在整体上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演员配备上，他嘱托阳翰笙，帮助配置强有力的阵容，即采用全明星制，把观众吸引到剧场来。为此，以上三个戏的演员配置，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棠棣之花》中由周峰饰聂政、舒绣文饰聂莹、江村饰严仲子、张瑞芳饰酒家女；《天国春秋》由耿震饰杨秀清、舒绣文饰洪宣娇、白杨饰傅善祥、项堃饰韦昌辉；《屈原》就更光彩夺目了，金山饰屈原、顾而已饰楚怀王、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连配角或近乎群众角色都由著名演员来扮演，如孙坚白

(石羽)饰宋玉、周峰饰仆夫、张逸生饰钓者。这样高水平的演出怎么不轰动山城，赢得观众。其影响所及，“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天国春秋》中台词）；“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屈原》中《雷电颂》）等名句流传在大街小巷，嘉陵江边，歌乐山头。那几年间重庆人看话剧成为时尚，通宵达旦排队购票常见不鲜。

1942年2月28日阳翰笙日记中写道：“经过数日的奔走，《屈原》全部演职员名单总算决定了下来。”“演戏也跟打仗一样，这大概也算是我们的特别国情。”为什么说演戏竟也跟打仗一样呢？因为白杨、施超、顾而已、张瑞芳、孙坚白、周峰等都分别属于国民党控制的《中万》、《中电》各剧团，国民党当局有时演坏戏，他们找借口不参加；他们出来演《屈原》这样借古讽今的戏，这不是要担风险吗。3月11日，阳笙翰日记中又写道：“豪兄（即周恩来）来谈甚久”，并注释说：“周恩来对《屈原》的演出很关心，阳曾应邀到孙师毅家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对（屈原）还未演出即碰到这么多的困难很感不安，当即作了许多对策性的指示。”

党和周恩来这样缜密细致的对待戏剧演出，戏剧工作者也深深体会到必须刻苦学习，以提高剧场艺术水平，才能争取观众。金山为演好屈原，苦下功夫学习《楚辞》，常在嘉陵江畔反复吟诵，始有所得。田汉主持过历史剧问题讨论；阳翰笙多次主持如何建立新现实主义戏剧体系的学习；夏衍卓有远见的发出“正规化”呼吁，号召演职员学习业务应是经常性的，为将来建立正规化剧院作准备。

为了提高戏剧工作者素质，经南方局文委讨论决定，1942年在《新华日报》增加《戏剧研究》专刊一种，这个专刊主要不是发表剧评，而是介绍各国演剧经验，刊登导演们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在进步力量领导下的《戏剧岗位》、《戏剧月报》、《戏剧时

代》等刊物也做了不少工作。戏剧界学习史坦尼演剧理论形成热潮，郑君里、章泯合译的《演员自我修养》；贺孟斧翻译的《我底艺术生活》；焦菊隐翻译的《聂米洛维奇——丹钦珂的回忆录》等书，戏剧工作者视为至宝。像这样如饥似渴的学习，又有连续不断的实践，极大地提高了演出水平。

继《屈原》等剧之后，洪深导演的《法西斯细菌》、史东山导演的《蜕变》、贺孟斧导演的《风雪夜归人》，章泯导演的《家》等剧，都各具风格，颇多创造，把导演提高到新水平；在这几出戏中，白杨扮演的静子，舒绣文扮演的丁大夫，路曦扮演的玉春，张瑞芳扮演的瑞珏，人物内心活动之细腻，赋予形体之表现都令人耳目一新。舞台美术水平在战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情况下，也有很大提高，担负了许多历史剧和世界名剧的演出任务。他们克服某些舞台设计上照相式的繁琐的自然主义，注意演出风格和内容的统一，作出一些独特追求，培养出一批专门人才。上述种种成就，周恩来都曾予以关怀并赞赏。

最后要提到的是，周恩来对戏剧工作者政治思想的关心、生活的关怀，以及对青年戏剧工作者的重视与培养，仅举数例如下：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经历各项斗争后，党更受到进步戏剧工作者的爱戴，要求入党者日多，这时一些人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对这些人需要做细致耐心的工作。宋之的要求入党，周恩来请夏衍善自转达了他的意见；周峰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亲自回信给他，请他暂时留在党外，以利工作，党对他以党员视之。对一些积极靠拢党的青年，通过张颖、周峰组织白杨、江村、石羽、王戎、刘厚生（已是党员）等成立读书会，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即使对演了不好的戏的演员，像秦怡演了《野玫瑰》，周恩来也不歧视她，派张颖去帮助她提高认识，卸掉包袱。关心她的工作与生活。最为重要的一次，1945年1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与董必武致电在重庆的王若飞，指出目前对大后方文化人整风不宜扩大